

第三章 《蘇日中立條約》與中蘇變局(1941)

1941年不僅是對中、蘇兩國，也對世界大戰的局勢有著重大變化的一年，那就是所有與戰爭相關國家的立場更為明確，也是他們重建對外政策的時刻。首先，當時對中國抗戰最大援助國蘇聯，與中國的敵國日本締結《蘇日中立條約》，帶給中國很大的衝擊。在歐洲，德國違背1939年與蘇聯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而侵略蘇聯領土。世界強國從此顯露出爭取霸權的意圖，同時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也宣告停止。1941年年底爆發的珍珠港事件，讓一直維持孤立主義態度的美國全面加入世界大戰，這就帶給中國新的希望。有些學者的主張，由於美國的參戰導致中、蘇關係的惡化，無論如何，1941年一連串發生的事件——例如《蘇日中立條約》、蘇德戰爭、珍珠港事變，皆由蘇日、蘇德、美日等國為主體的事件，而不是以中國為主體。但這些事件都影響到中、蘇兩國關係的變化，因此本章試圖透過對這些事件的考察，檢討這一連串事件對中蘇關係的影響。

第一節 《蘇日中立條約》締結和蘇德戰爭的爆發

一、《蘇日中立條約》締結的背景

蘇聯和日本兩國於 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簽訂了中立條約，並發表共同宣言。條約正文有四條，其內容如下：

一、締約雙方保證維持兩國之間和平與友好關係，相互尊重締

約另一方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二、如締約一方遭受來自一個或幾個第三國的攻擊時，締約另一方保證在整個衝突時間內保持中立。

三、本條約自締約雙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5年。如締約一方在本條約有效期屆滿前未聲明廢止，則本條約應視為自行延長5年。

四、本條約須儘快批准，批准書也應儘快在東京互換。¹

透過這份條約的內容，可見蘇、日兩國的處境和期盼，蘇聯希望在德國進攻的同時，日本不會在遠東造成威脅，以避免陷於兩面作戰，所以希望日本至少保持中立。日本也是如此，爲了防範日後可能發生的美、日戰爭，以及爲了很順利地進行南進政策，因而希望蘇聯保持中立。

其實關於蘇、日兩國締結中立條約的背景和影響，學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尤其是有人王世杰所說的話：「介公（蔣介石）重視英、美友誼過於一切」²，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親美傾向造成蘇聯決定中立條約的主要因素，亦即蔣介石的親美的傾向妨礙中蘇關係的發展，再加上他自1927年以來所呈現的反蘇、反共傾向，使蘇聯站在自衛的立場。³這種主張時常可在1990年以前大陸學者所發表的文章中發現，但1990年以後，隨著世界政治環境的變化，尤其是以前標榜共產主義的國家紛紛開放，這種看法已經大幅減少。其實，借用王世杰所說的話，蔣介石與國民政府的確重視英美過於其他友邦，惟不可公開表示，而且只是來自於蔣介石對蘇聯的擔憂。亦即蘇聯對中國一向存有偏見，其所謂的偏見一如蔣介石自己所說的「俄總以爲中國必參與

¹ 蘇聯《真理報》1941年4月14日：轉引自李嘉谷，《中蘇國家關係資料匯編（1933-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頁367。

²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往來電稿》（北京，中華書局，1978），頁26。

³ 鍾家棟，〈一九四一年中國與蘇日中立條約〉，《檔案與歷史》1987年第3期，頁73。

英美陣線；總以為中國是反俄的，故不如當英美無暇顧及時，乘機滅亡中國」⁴等。由此可見當時的蔣介石對蘇聯的擔憂和不信任確實很深。雖然如此，抗戰初期蔣介石只能仰賴蘇聯的援助，而不能與蘇聯公然敵對，反而必須竭力拉攏蘇聯，以維持友邦的關係。因此，我們可以看出蔣介石不可能公然表態其反蘇親美的立場，而促使蘇聯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反而可以發現蔣介石為竭力維持與蘇聯的關係所做的努力。

其實蔣介石外交方面並沒有無能地坐視，他對國際關係取了較正確的觀察並表示較主動的運作。例如，自從1940年後半期開始，蔣介石一直關注蘇、日兩國互相妥協的可能性。因此，在1940年蔣介石指派邵力子擔任駐蘇大使時，就交待要「爭取蘇聯免與日寇妥協」，「阻止蘇聯對日妥協，成立類似蘇德互不侵犯協定那樣的東西。」⁵ 1940年10月18日，邵力子報告與蘇聯外交次長的談話內容報告，「（蘇聯）對日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亦祇為其避免某潮流壓力之不得不的辦法，故必徒具形式無問實際。」⁶雖然邵力子報告蘇聯不得已將與日本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而且說那只是個一種形式，然蔣介石依然認為這只是蘇聯方面的藉口，因為蘇聯主動想與日本締結條約的歷史已長達15年。⁷ 到1936年11月25日德日兩國簽訂《防共協定》以前，蘇聯持續向日本要求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日本對條約則表現消極的態度，與此相反，蘇聯的表現反而較為積極。

1937年7月7日，中日戰爭爆發，蘇聯雖然是中國的最大援助國，

⁴ 1940年10月6日條，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下)，頁582。

⁵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對蘇外交：一般交涉，第42冊67號。

⁶ 《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對蘇外交：一般交涉 第42冊75號。

⁷ 1926年8月、1927年5月24日、1928年3月8日、1932年1月12日、2月14日、2月29日、3月7日、9月15日、10月19日、11月3日，都是蘇聯先向日本提出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事，但都被日本拒絕。當時日本以時機不成熟等理由拒絕。到中蘇兩國恢復外交關係後，日本立即表示不願與蘇聯締結任何條約，進而在1936年與德國簽訂防共協定，因此蘇聯似乎完全喪失與日本妥協的餘地。但1939年8月23日蘇德兩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後，蘇日兩國得到重新檢討締結政治條約的機會。

但蔣介石人不完全信賴蘇聯，尤其是從1939年8月23日蘇聯與德國在莫斯科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以後，蔣介石更加懷疑蘇聯的外交態度，他即曾在日記中有感而發地寫道：

當英、法、蘇正在莫斯科進行會談之際，而蘇德竟忽宣布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俄之外交雖玩弄技巧，英法雖見受欺，而俄之信用亦損失殆盡矣。……以後對俄之外交，則不能不特別慎重矣。⁸

由此可見，《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給蔣介石對蘇聯的信賴造成負面的影響，因此蔣介石認與蘇聯的關係不得不更為謹慎。

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後不久，蔣介石察覺到蘇日接觸的動向。這次兩國的接觸是由日本首先主動提出政治協商。1940年日本通過大本營陸海軍制定的《適應世界形勢演變的時局處理綱要》，並決定南進政策。然後，日本為排除實行南進計劃後蘇聯所能造成的威脅，因而決定與蘇聯改善關係。1940年8月5日，日本駐蘇大使東鄉茂德，拜會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時提出，日本希望儘快締結日蘇中立協定，8月14日莫洛托夫表示贊同。⁹如前所述，1926年以來蘇聯一直先向日本提出互不侵犯條約之簽訂。但這次是日本反而是先向蘇聯表示願意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蘇聯的答覆只是個中立條約。在1940年10月30日，日本新任駐蘇大使建川美次向蘇聯提出希望締結類似《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要求，並送交條約草案。其實，1936年德國與日本締結《防共協定》牽制蘇聯後，1939年德國再與蘇聯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這就違背《防共協定》的意義，這點可讓我們思考，在國際關係上，自國利益與意識形態的優

⁸ 1939年8月23日條，秦孝儀總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頁396。

⁹ 蘇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6，1940年，目錄2，案卷15，第3-5章、第63-79章；轉引自李嘉谷，〈「蘇日中立條約」簽訂的國際背景及其對中蘇關係的影響〉，《中國現代史》2002年第11期，頁99。

先順序。據日本送交蘇聯的條約草案看，其內容幾乎與《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相似。¹⁰

值得注意的是，《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和日本送交的《日蘇互不侵犯條約》除了正文類似以外，在另外附加的文件上，又指定所謂的「利益範圍」。其實，蘇德兩國在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同時，又締結了秘密議定書，該議定書明訂蘇、德兩國瓜分在波蘭的利益。然後 1939年9月28日在與德國簽訂國境與友好條約，並根據與該條約一起簽訂的秘密議定書中，即明訂合併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等地。這一點與締結《蘇日中立條約》時所發表的共同宣言類似，在共同宣言明示，蘇、日互相承認在中國領土內自身的利益。以此結果，蘇聯似乎得到國境安全的保障和自國利益。但是蘇聯對德仍未能放心，因為此後德國連接侵攻挪威（Norway）、丹麥（Denmark）、荷蘭（Netherlands）、比利時（Belgium），這就讓蘇聯不得不擔心德國的下一步驟。進而在1940年9月27日德、義、日三國於柏林（Berlin）締結三國同盟後，日本向蘇聯解釋說，這是為牽制美國戰爭狂的措

¹⁰ 日本提出的〈日蘇互不侵犯條約草案〉（1940年10月30日）：

第一條 締約雙方保證相互尊重領土主權，不對另一方採取任何侵略行動，無論這種行動是單獨的，或是同一個或幾個第三國聯合的。

第二條 如締約一方成為一個或幾個第三國侵略的對象時，締約另一方保證不以任何方式支持這些第三國。

第三條 兩締約國政府今後保持秘密接觸，以便在有損兩國政府共同利益的問題上交換情報或提供諮詢。

第四條 締約任何一方保證不參加直接或間接反對另一方的任何國家集團。

第五條 締約雙方在任何問題上發生爭執與衝突，將按照友好交換意見的方式或在必要時建立調解衝突委員會，以和平方法解決。

第六條 本條約自簽字日起生效，有效期十年。如締約任何一方在本條約期滿前一年內未聲明廢除，本條約有效期將自動延長五年。

蘇聯提出的〈蘇日中立條約草案〉（1940年11月18日）：

第一條 締約雙方聲明維持和平與友好關係，相互尊重領土完整。

第二條 如締約一方成為一個或幾個第三國的攻擊對象時，締約另一方在整個衝突期間保持中立。

第三條 本中立條約自簽字之日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五年。如締約任何一方再條約期滿前一年未聲明廢止，本條約將自動延長五年。

以上二草案原藏於蘇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6，目錄2，案卷17-18，轉引自李嘉谷，《合作與衝突1931-1945年的中蘇關係》，頁196-197。

施，但蘇聯則認為三國同盟所針對的目標是蘇聯。¹¹如同蘇聯的預料，不久後德國向巴爾幹(Balkan)半島進軍，把它作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並由東南方威脅蘇聯。因此，蘇聯為穩定遠東局勢，1941年4月13日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如此，蘇、德、日三國不僅以條約的政治手段緩和對自己的潛在性威脅，同時還不忘尋求自國的利益。

從蘇、日兩國締結中立條約的談判過程和內容可見，日本的表現確實比蘇聯來得積極。日本改定以南進政策為國家基本方針後，主動地尋求與蘇聯改善關係。正如美國學者赫伯特菲斯（Herbert Feis）所說：（《蘇日簽的條約》）「緩和了陸軍長期以來，想與俄國作戰的衝動，帶來了使蔣介石屈服的希望，並使南進的道路更安全些。」¹²雖然根據北庫頁島的租讓權和漁業協定的問題，中立條約的協商無法順利進行，但日本為進行南進計劃，不得不主動接近蘇聯。所以1941年3月24日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在前往柏林的途中過境莫斯科，拜會史達林和莫洛托夫，還提出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要求，蘇聯承諾締結中立條約，其結果就是在4月13日兩國締結《蘇日中立條約》。

二、中國對《蘇日中立條約》簽訂的反應

日本與蘇聯以彼此的安全和利益為考量，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締結《蘇日中立條約》。條約的正文內容是折衷10月30日日本提出的草案和蘇聯提出的修正案而成的。該條約的內容比日本當初提出的草案簡單，反而更接近蘇聯的版本，日本似乎接受蘇聯的意見。以中國的立場來看，當然並不樂觀敵國和同盟國的交流，但如果日本和蘇聯的意圖不外是基於自國安全的保障，除了道義上的譴責外，缺乏正

¹¹ 華崗，《蘇聯外交史》，（上海，海燕書店，1950），頁234。

¹² 赫伯特·菲斯，《通向珍珠港之路——美日戰爭的來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頁199。

當理由予以強烈反對和抗議。而且在當時的國際局勢下，國民政府已經掌握日本和蘇聯妥協的動向：蔣介石任命邵力子為駐蘇大使以後，要求特別注意蘇日兩國的動態，邵力子於1940年10月5日回報與蘇聯拉代夫斯基次長的談話內容，當時拉代夫斯基次長並未明確否認傳言之日蘇不侵犯條約¹³，10月18日邵力子再度致電蔣介石說：「蘇即使對日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亦祇為其避免某潮流壓力之不得已辦法。」¹⁴此外，從美國國務院得知蘇聯的消息，日本將對蘇聯讓步，藉以換取日蘇互惠條約。¹⁵值得注意的是蘇聯方面似乎並未加以保密，所以蘇、日兩國是公然簽訂中立條約。1941年4月11日簽訂條約之前，中方代表張冲和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A. S. Paniushkin)談話時，潘大使迴避日本外相松岡和史達林談話的具體內容，只是表示「蘇聯決不為自己而犧牲人家的利益」。¹⁶在蘇聯和日本簽訂中立條約前不久，中國的了解只是如同其他國家所知，一旦爆發蘇德戰爭，蘇聯希望日本保持中立，而不帶給蘇聯任何威脅。根據當時國際局勢來看，世界各國都大致預測到此，但對中國而言，中國的最大援助國蘇聯和敵國日本妥協，在道義上是無法接受的事實。不僅如此，蘇、日兩國所發表的共同宣言中含有侵害中國主權的內容，更令中國失望：

按照1941年4月13日蘇聯和日本所簽訂的中立條約的精神，並為保證兩國間的和平友好發展的利益，蘇聯政府和日本莊嚴地

¹³ 〈駐蘇大使邵力子自莫斯科呈蔣委員長報告拉代夫斯基次長對傳說中的日蘇不侵犯條約之態度電(摘要)〉(1940年10月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 戰時外交(二)，頁381。

¹⁴ 〈邵力子電蔣中正史達林函已由蘇外次交到俟譯妥即電陳〉(1940年10月18日)，《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對蘇外交：一般交涉 第42冊75號。

¹⁵ 〈王芄生等呈蔣中正敵松岡赴歐謀調整日蘇關係及求德援助〉(1941年3月16日)，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敵偽各情：敵情概況 第2冊101號。

¹⁶ 〈張冲呈蔣中正晤潘友新大使為蘇方接見松岡事談話情形〉(1941年4月1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對蘇外交：一般交涉 第42冊85號。

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¹⁷

日本外相松岡曾經在1941年4月9日拜會莫洛托夫時，提出簽訂關於勢力範圍的秘密議定書，在議定書內容中，將內蒙古與中國東北劃入日本的勢力範圍，而蘇聯的勢力範圍則是蒙古人民共和國與新疆。¹⁸當時日本已在中國東北與華北建立傀儡政權，蘇聯也在外蒙古與新疆橫行無忌。但是這些地區皆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從未承認該地區的獨立。尤其外蒙古是自從1924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以來，向來就是中蘇兩國爭執的焦點。外蒙古位於中國北部，曾經在1911年（宣統3年）得到沙俄之鼓動，意圖獨立。1912年11月22日中俄兩國同時公佈所謂「中俄聲明文件」，其內容包括「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古之宗主權，中國承認外蒙古之自治權」等項，蒙古的獨立因而暫停。¹⁹1921年7月12日，在俄國共產黨紅軍配合下建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11月5日簽訂〈俄蒙友好條約〉。此後蘇聯軍隊進駐庫倫，北京政府對此表達抗議並要求撤軍，但蘇聯只給予「（蒙古）為中俄共同利益，俄軍不能自庫倫撤退」之答覆，從未隱藏對蒙古的野心，並且於1924年5月10日，在蘇聯操控下，將「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改成「蒙古人民共和國」，²⁰此後蘇聯也切入對民國以來外蒙古一直提出的獨立問題，因而外蒙問題成為中蘇之間的一個爭論性話題。國民政府在取代北京政府成為中國代表之政權後，中國擺明外蒙古現況是「自治」，以及其領土主權屬於中國；而另一方面，蘇聯挑撥中國與外蒙的糾葛狀態，使外蒙古成為中蘇邊界問題中是很敏感的一件事。

¹⁷ 《國際條約集(1934-1944)》，頁304。

¹⁸ 李嘉谷，《合作與衝突1931-1945年的中蘇關係》，頁198。

¹⁹ 李毓澍，《外蒙古撤治問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頁26-28。

²⁰ 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頁57。

以滿清的遜帝溥儀為元首的滿洲國，正式成立於1932年3月9日。其官員多數為日本關東軍和滿鐵的官員，因而處在日本的影響下。1935年中、蘇兩國以中東鐵路出售的問題為由，發生了糾紛。1935年3月23日，蘇聯與日本及滿洲國簽訂了關於轉讓中東鐵路的基本協定，將中東鐵路賣給日本和滿洲國。蘇聯在承認滿洲國的同時，亦侵害中國的主權。

這樣外蒙古和滿洲國的問題，對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而言，不但是對主權和利益的傷害，同時也傷害民族感情。所以我們不得不思考，蘇聯為何會超越他們所主張的「安全保障」，而提出會製造中、蘇兩國關係惡化的問題？如果以安全保障的角度理解中立條約，共同宣言在利益的層次上可以理解。正如羅志剛所言：「抗戰時期蘇聯以維護國家利益，主要是安全利益為基準，採取一種非常現實的態度，來制定對外政策，處理同中國的關係。」²¹因此，若蘇聯的戰略與中國利益出現矛盾，蘇聯為確保自身利益，將會不惜犧牲中國的利益，反之，中國的利益若抵觸蘇聯的利益，蘇聯將不再對中國表示友好的態度。

針對與中立條約同步發表的共同宣言，改善與日本關係的同時，蘇聯似乎願意處理尚未解決的問題。亦即不依據1905年日俄戰爭後締結的《朴茨茅斯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而希望在遠東地區重新劃定勢力範圍。日本對此表示同意。日本希望能透過與蘇聯關係的改善，而能達成滿、蒙以及日本海等地區利益相衝突的地帶，劃分勢力範圍，藉以穩定兩國關係。根據這樣的想法，日本外相松岡在1941年4月9日會見莫洛托夫時，提議簽署關於勢力範圍的秘密議定書。²²這項提議對蘇聯為一大鼓舞，該結果以共同宣言呈現。

《蘇日中立條約》和共同宣言公佈後，中國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王寵惠於4月14日發表如下聲明駁斥：

²¹ 羅志剛，《中蘇外交關係研究(1931-1945)》，頁2。

²² 李嘉谷，《合作與衝突——1931年-1945年的中蘇關係》，頁198。

查東北四省及外蒙之為中華民國之一部，而為中華民國之領土，無待贅言。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第三國間所為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任何約定，決不能承認，並鄭重聲明，蘇日兩國公佈之共同宣言，對於中國絕對無效。²³

《蘇日中立條約》和共同宣言，特別在精神方面給中國相當大的衝擊。蒙古人民共和國和滿洲國的條款，除侵犯中國領土主權外，還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中國方面對《蘇日中立條約》的反應，不僅限於官方，一般人民也表現出激烈的反應。如上所述的「決不能承認」，中國外交部的反應不太強烈，當時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的言論亦似乎避開激烈的批評：

乃蘇日協定竟成立於中國正在抗戰的途中，而且在蘇聯累次聲明反對侵略行動之後，這不免予中國國民以奇異的感想。²⁴

因為蘇聯仍然是中國最大的援助國，無論如何國民政府仍然需要蘇聯的援助，所以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決定不惡化與蘇聯的關係。反之，民間的《大公報》，其社論直接表露出一般大眾和知識份子的感受：

中國一般知識份子，對蘇聯多年特別重視，還不僅為直接的利害關係，並且因為相信列寧扶助東方被壓迫民族政策有重量有前途之故。……因此中國人易於判斷蘇聯在理論上不應與日本妥協。今日證明蘇日的確妥協，中國知識界可由此證明過去二十年來觀察的錯誤，同時嚴格證明支配國際關係的要素，絕對是一元，就是國家本位的利害關係。……蘇聯領袖史達林氏，中國人一般多年對之甚表崇敬，……在中國人普通眼觀看，史氏是世界上一個甚神秘甚重要的存在。……但中國人這種觀

²³ 《申報》，1941年4月15日條。

²⁴ 《中央日報》，1941年4月15日條。

念，現在卻感到幻滅了。²⁵

對於《大公報》的這篇社評，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在4月19日會見蔣介石時，曾經提出過抗議：「大公報15、16日之社論，蘇聯則覺得言論過激。……其中有謂知識界而10年來對史達林之影仰與信賴，將因此發生動搖。」蔣介石對此答覆說：「吾人對於史達林先生個人之景仰，決不因此之條約而減少也。惟大公報所言，亦足見我國一般知識份子與許多民眾對於該項條約之心理。」²⁶蔣介石這樣的態度，也出自於盡量避開與蘇聯的關係惡化的意圖。雖然當時中國向美國積極要求援助，但在還沒有得到美國明確的答覆，國民政府不能打破與蘇聯的關係。

其實蔣介石早就察覺到中、蘇兩國難以維持圓滿的關係，即說「俄不以平等國家待我，故惟有自立自強，方能爲人所重耳。」蔣介石似乎體認中國實力不強，並靠外來的援助作戰的現實，就是使蘇聯和其他國家忽視中國的主要因素。但由於當時中國的戰況不利尚需蘇聯提供軍援，蔣介石只能選擇維持中蘇關係。所以雖然向蘇聯提出抗議，聲明卻不算激烈，而且在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對大公報的社論提出抗議時，蔣介石還告訴潘友新說：「貴國爲我最信賴之友邦，中國外交，始終貴國佔在第一位，今後仍望其如此，只須吾人能於事前開誠商討，當不致有誤會。」²⁷4月15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王世杰在致駐美大使胡適的電報中也表示同樣的意思：「日、俄協定事，除由外部就滿蒙問題聲明立場外，我將不對蘇作其他批評，以免造成反蘇印象，爲敵利用。」²⁸由此可見國民政府要維持中、蘇關係的用心。

中國對日戰爭所需外援甚巨，蘇聯援助仍屬杯水車薪，所以抗戰

²⁵ 《大公報》，1941年4月16日條。

²⁶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1年4月19日。

²⁷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1年4月19日。

²⁸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組編，《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往來電稿》，頁101。

以來一直向英、美兩國要求援助，尤其在蘇、日兩國簽訂中立條約後，更積極推動與英、美兩國的合作。1941年4月14日，蔣介石與英國武官戴尼斯談話時，蔣介石問「貴我兩國國交今後仍僅止於現時之狀態乎，抑應作更進一步之合作？對此問題，貴國政府之決議為何，余所亟願聞知者也。……余國見蘇日已訂中立條約，此後時局，不待明言，日必南進，情勢已是異常緊急，故貴我兩國進一步之軍事合作，實屬刻不容緩。」²⁹1941年4月16日蔣介石與美國駐華大使詹森談話時，促美援助：「切望貴國政府能按照約定程序，早定具體計劃以各種軍事器材供給我國，倘能實現，則不獨有助我抗戰實力，實亦足以安定人心也。」³⁰蘇、日兩國簽訂中立條約後，國民政府更積極尋求與英、美的合作。中、蘇在復交及締結《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縱使兩國成立合作關係，中國獲得蘇聯的援助，兩國仍尚未建立完全信賴的關係。

1920年代的中蘇關係由於意識形態的糾葛而破壞，1930年代他們能恢復的理由幾乎是基於國家的利益上而考量。但是他們在意識形態的糾葛未解，且在隱藏該項因素的情況下進行合作，所以中、蘇兩國在表面上是有合作關係，而在合作的背後卻隱藏著不穩定的因素。蘇、日簽訂中立條約後，中國外交呈現兩種走向——對蘇聯消極抗議並繼續維持對蘇關係，同時積極爭取與英美的合作，這兩者都是根據國家利益所作的考量。

²⁹ 〈蔣中正與戴尼斯談話紀錄蘇日中立條約日本南進中英軍事合作〉（1941年4月14日），《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對英外交：一般交涉（下）第40冊1號。

³⁰ 〈蔣中正與詹森談話紀錄蘇日中立協定探討巴爾幹埃及戰事觀察促美援華〉（1941年4月16日），《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對美外交：一般交涉（上）第28冊62號。

三、蘇德戰爭的爆發和對中蘇關係的影響

西方國家的立場和蘇聯的對外政策互相銜接，蘇聯摸索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和平關係，藉以將蘇聯建立為先進工業國家。為此，蘇聯在對外關係上採取較為謹慎的態度。然而，此時歐洲的內部出現變數，與法西斯主義者形成的同時反蘇反共潮流抬頭。亦即在蘇聯東西兩個邊境，納粹主義的德國和軍國主義的日本，皆標榜反共並決議聯合，就以《防共協定》來呈現。³¹雖然該協定是以抵抗「共產主義者的威脅」守護自國的安全，而形成反布爾什維克主義國際陣線為名義而締結，並不直接針對蘇聯，然還是對蘇聯形成嚴重的威脅。而且1937年7月，中、日兩國間爆發全面性的戰爭，1938年2月德國強制吞併奧地利，1939年春季德國還侵略捷克，蘇聯處於日本和德國雙面夾攻的可能，然而西方國家對之則採取觀望態度。

蔣介石曾經向史達林要求蘇聯對日宣戰，史達林則以「向日本宣戰從政治上看對蘇聯不合適，不能這樣做……」³²為理由而予以拒絕。這因為是在世界各國尚未對蘇聯表示友好態度的時候，蘇聯不敢貿然與日本作戰，再加上史達林認為蘇聯尚未做好與德國進行全面作戰的準備下，他的確需要時間重新裝備蘇聯軍隊³³，所以蘇聯一方面向英、法兩國提議締結集體安保條約對抗德國³⁴，另一方面則對德國採

³¹ 德國在1936年11月25日與日本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Anti-Comintern Pact)》，1937年11月6日義大利也加入。由希特勒主導的該協定實際上是針對蘇聯的，當時希特勒在公開的場合上批評布爾什維克主義，對東北亞表示關係日本在中日戰爭上進行的活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根據該協定，宣傳他們對抗共產主義受護西方國家的安全和自由理念。

³² 劉彥章等編，《斯大林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頁501。

³³ 1941年3月26日，史達林在克里姆林宮接見副航空工業人民委員、飛機設計師雅科夫列夫時，說過：「我們1939年與法西斯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是對的，我們因此贏了一年半的喘息時間。」（劉彥章等編，《斯大林年譜》，頁541）。

³⁴ 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十六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2003），頁30-31。

取懷柔手段。在1939年3月10日至21日召開的聯共第十八次代表會議上，史達林提出《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其中關於國際形勢的部份，史達林提出資本主義國家所發行的報刊中，所謂德國人正在向烏克蘭進軍等叫囂，意在激起蘇聯對德國的憤怒，藉以挑撥蘇聯與德國發生衝突。³⁵所以史達林認為蘇聯不僅要進一步加深對西方國家的戒心，而且還表明蘇聯對外政策的方針開始轉向一國自保。³⁶史達林在東西兩個陣營遭受德、日兩國的威脅，但美國仍一直維持不干涉政策，英、法、德、義四國以《慕尼黑協定》為蘇聯帶來孤立感和危機感，蘇聯為求自衛而向德國表示妥協之意。1939年5月3日，史達林解除猶太裔李維諾夫外交人民委員的職務，而改由莫洛托夫接替，然後的國駐蘇臨時代辦關於李維諾夫辭職致電德國外交部：

他（李維諾夫）被解職是史達林個人做出的決定。據推測，這個決定與克里姆林宮對李維諾夫進行談判存在著分歧有關。上述分歧的原因可能是史達林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極不信任。在最近舉行的黨的代表大會上，史達林號召謹慎小心，以防止蘇聯卷入衝突之中。莫洛托夫不是猶太人，具有史達林的「密友和戰友」的聲譽。對他的任命顯然是旨在保證執行史達林提出的對外政策方針。³⁷

如上引用的電報內容，蘇聯表示誠意並願與德國和解。如前所述，蘇聯在這段期間都在試探英、德雙方的意思，但英國在5月8日在答覆蘇聯所提出的締結集體安保條約的建議時表示，無法為愛好和平的國家，在歐洲建立抵抗侵略國家進一步擴大的基礎。³⁸這是造成最後讓史達林倒向德國的結果。史達林於5月20日指示莫洛托夫與德國駐蘇

³⁵ 劉彥章等編，《斯大林年譜》，頁510-511。

³⁶ 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十六卷，2002-2003，頁23。

³⁷ 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十六卷，頁29。

³⁸ 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十六卷，頁30。

大使舒倫堡會談，並於7月14日出席中央政治會議討論，蘇、德貿易問題時說道：「我們準備滿足德方。」³⁹如此，史達林對德國的表現更爲積極，德國也對此表示願意改善兩國關係，莫洛托夫因而向德國提出蘇、德兩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⁴⁰，並附加了相關議定書。8月20日史達林在接到希特勒的電報後⁴¹，同意接見德國外長，作出要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最後決定。

雖然蘇聯對英、法等國的失望而導致蘇聯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但締結《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一項重要的因素，亦是國家利益。根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同時締結的「秘密附加的議定書」，這份秘密議定書的內容，包含德、蘇兩國同意瓜分波蘭和全東歐，9月1日德國進攻波蘭西部地區，蘇聯在9月17日進攻波蘭的東部地區，9月29日兩國瓜分波蘭。然後蘇聯接連吞併東歐地區；11月30日進攻芬蘭，1940年8月吞併波羅的海三國。如此，《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不僅是蘇聯爲克服東西兩個邊界的威脅而締結的國家防衛的措施，進而且是徹底爲國家利益著想的行爲。

蔣介石特別關注蘇聯的行動，並關切其以後會有的對遠東的影響；

當英、法、蘇正在莫斯科進行會議之際，而蘇德忽宣布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英法雖見受欺，而俄製信用亦損失殆盡矣。其中所得者為德，而最失敗者為日寇。以後對俄之外交，則不能不特別慎重矣。⁴²

上述引文透露出蔣介石對蘇聯的疑慮，這不僅是根據意識形態的落差，蔣介石甚至曾預測個蘇聯爲自國的利益隨時可能背棄中國，從

³⁹ 劉彥章等編，《斯大林年譜》，頁515。

⁴⁰ 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十六卷，頁56。

⁴¹ 希特勒透過里賓特洛甫致使大林的電報中說道，他接受莫洛托夫轉交的互不侵犯條約草案。（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十六卷，頁59）。

⁴² 1939年8月23日條，秦孝儀總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頁396。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之締結，重新確認無法給予蘇聯完全之信任。進而他擔心由於《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所帶來的影響，歐洲局勢日趨急迫，因而歐洲各國可能試圖與日本妥協。⁴³其實，蔣介石一直向蘇聯要求對日宣戰，但蘇聯則答以須先由「英國或美國參加對日作戰」為先決條件⁴⁴，以當時的情況來看，這幾乎是不會發生的事。蘇聯為拒絕蔣介石的要求而找出這項藉口。然而萬一如同蔣介石的假設，英國與日本作出任何妥協，中日戰爭將更為艱難。蔣介石不僅對於《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同時亦對於蘇聯進攻波蘭和芬蘭等周圍國家的事實，並沒有表示任何意見。雖然他在日記上使用「國家的信義、國際關係上的道德」等語詞批評蘇聯⁴⁵，但從未做任何公開批判，這是因為中國還是需要蘇聯維持親密關係。在蔣介石顧慮的問題中，雖然沒有發生英、法等國與日本妥協的事，但1941年4月13日蘇、日兩國締結的中立條約敦使蔣介石重新確信必須慎重處理對蘇外交，直到此時蔣介石仍有意來「道義」或「信義」等觀念處理外交事務的傾向⁴⁶。由此可見，國際關係是決不是基於運用「道義」或「信義」等抽象概念，而是以國家實際利益為基礎而運用國際關係。

蘇、德兩國的蜜月期並未持久，《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締結的一個星期後，即於1939年9月1日，德國進攻波蘭，不久後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向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及法國長驅直入。德軍的氣勢昂昂，就連蘇聯也感到威脅，不僅如此，1940年9月27日德國與日本、義大利所締結的三國同盟協議足以威脅蘇聯。蘇、德兩國雖然

⁴³ 1939年8月29日條，秦孝儀總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頁404。

⁴⁴ 羅志剛，《中蘇外交關係研究，1931-1945》，頁185。

⁴⁵ 1939年9月17日條，秦孝儀總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頁413。

⁴⁶ 蔣介石聽到《蘇日中立條約》簽訂的消息後，自己所感曰：「俄、日簽訂中立協定，內容有互相承認外蒙與偽滿洲領土完整之條文，此乃俄損人利己一貫之慣技，實其在國際信義上之最大損失，……」（秦孝儀總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下），頁671）。

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但就當時的國際局勢來看，無人能預測昨日的同志將於何時變為敵人。

1940年9月27日，德國與日、義兩國結為「三國同盟」，其理由是為牽制美國，而且「經濟軍事同盟」，其內容為日本承認德、義兩國所建立的「歐洲新秩序」，德、義兩國亦承認日本所建立的「大東亞新秩序」，而且德、義、日三國還相互承諾若受到不與現在的歐洲戰爭或中日戰爭相關勢力的攻擊，其他盟國皆須動員各項政治、經濟、軍事手段擊退攻擊者。其所謂的「不與歐洲戰爭和中日戰爭相關的勢力」，不僅是指美國，在潛在的意義上，不能將蘇聯排除在外。此外，這次三國同盟雖然將矛頭指向美國，但對蘇聯而言，卻不能對三國結盟漠視不理。

史達林透過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奇斯佳科夫（A. M. Ghistyakov）少校訪問德國後的報告，大致了解德國的戰爭準備概況和德國國內形勢⁴⁷，至少是為了爭取戰爭所需的資源，而促使德國不得不進攻蘇聯，這是蘇德戰爭爆發之前，史達林預測德國即將進攻蘇聯的原因：

在參與制定修訂作戰計劃時認為，希特勒在對蘇戰爭中首先是力圖佔領烏克蘭和頓河流域，以奪取蘇聯最重要的經濟地區，掠奪烏克蘭的糧食、頓涅茨的煤、高加索的石油。還說，沒有這些最重要的資源，德國法西斯就不可能進行長期的大規模的戰爭。⁴⁸

史達林根據德國戰爭計劃和需要，預測過德國將會進攻蘇聯。於1940年10月13日，德國外交部長立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ontrop）致電，「向史達林介紹了德國和義大利在歐洲的戰略利益，德、義、

⁴⁷ 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十六卷，頁84-106。

⁴⁸ 劉彥章等編，《斯大林年譜》，頁532。

日聯盟旨在與蘇聯友好合作的願望，並稱在希望希特勒看來，包括蘇聯在內的義大利、日本和德國四大國的歷史使命是，採取一項長遠的政策，通過進行長久的利益的劃分，將本民族的未來發展納入正確的軌道。」⁴⁹莫洛托夫正在準備訪問柏林時，史達林指示其須探明現在和將來蘇聯在德國所提出的計劃中的地位究竟會如何。⁵⁰莫洛托夫在與希特勒會談中得知，德國對蘇聯不要求給予任何軍事援助，只是要求某些原料、原料產地與之相關的地區。⁵¹這些戰爭所需要的原料之供應，與上述史達林的預測一致。莫洛托夫認為，這樣在某些情況可能會背離他與史達林所確定的關於利益地區的觀點。這種背離的情況早在德、蘇對波蘭作戰時期即已出現⁵²，蘇聯方面因而判斷與德國的聯盟終究難以維持。

1941年6月22日，德國一邊由其外交部照會蘇聯政府，一邊由其宣傳部長於廣播中朗讀希特勒作戰宣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被視為無效。德軍的進攻並不是讓蘇聯感到警惕的新消息。如前所述，從1940年年底以來，德軍一直增強兵力集結於蘇聯邊境。隨著蘇、德關係的惡化，蘇聯要解決與英、美懸而未決的關係。美國國務院早就得知德軍即將進攻蘇聯的情報，當德國實際進行對蘇進攻時，美國國務院重新建立對蘇方針。國務院的 Ray Atherton 和 Roy Handerson 道及「蘇聯在受德軍的攻擊時，如果史達林要請援助，美國可以緩和對蘇貿易的制裁」⁵³，但是如果蘇聯被德軍擊敗而其政府當流氓政府，並美國能否肯定蘇聯流亡政府，關於這一問題他們則迴避答覆。他們總要堅持，蘇聯對德國的對抗，美國援助蘇聯與美國的國際原則或為此原則而鬥爭毫無關聯。⁵⁴像自1934年到1936年擔任駐蘇大使的蒲立

⁴⁹ 劉彥章等編，《斯大林年譜》，頁533。

⁵⁰ 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十六卷，頁107。

⁵¹ 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十六卷，頁120-121。

⁵² 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十六卷，頁121。

⁵³ Maddux, *Years of Estrangement*, p.144.

⁵⁴ *Ibid.*

德（William C. Bullitt）等對蘇強硬派的人警告說，如果美國援助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將全歐洲變成共產國家，因而主張美國對蘇聯應採行強硬政策。⁵⁵ 但是羅斯福總統拒絕蒲立德的對蘇強硬政策，反而贊同韋爾斯（Sumner Wells）的主張。在德國進攻蘇聯的時候，他主張「對美國而言，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無法忍受的主義，目前對美國最爲危險的是納粹的侵略。」⁵⁶ 邱吉爾也在6月22日的電台的演說中表示，他過去雖然反對共產主義，但今後歡迎蘇聯成爲同盟國的一份子，並答應提供給蘇聯積極援助。⁵⁷ 由此美國和英國正式發表援助蘇聯之意。1941年7月30日至8月1日霍浦金斯（Harry Hopkins）訪問莫斯科時，史達林承諾，蘇聯即將向英、美兩國公開蘇聯軍隊的裝備，並要求戰爭所需要的2萬門的岸防砲、1百萬挺機關槍、製造飛機用的鋁以及戰機等⁵⁸，對其要求於10月30日羅斯福致信史達林承諾，給予蘇聯無息援助⁵⁹，到戰爭結束之前美國對蘇聯提供的相當於1百11億美元的援助。如此，蘇德戰爭的爆發使蘇聯作爲西方國家大同盟體制的其中一員，此後，蘇聯得到英美的援助。那麼，蘇德戰爭的爆發對中國有何影響？

關於此問題最重要的是蘇聯對華援助。抗戰初期蘇聯對中國的物質援助巨大，最重要的是軍火貸款。1941年5月，美國發表租借法案，承諾提供中國軍械物品，在此之前，中國的抗日戰爭幾乎是只有得到蘇聯的外援。但在租借法案發表後，蔣介石轉而注意美國的援助，6月24日蔣介石認爲，「倭可能乘德俄之戰時，先消滅俄國在遠東之勢力，因其以爲俄在遠東勢力被消滅後，則中國問題自易解決。中國今日之國際助力在英、美，而不在俄國。故即使其遠東勢力被消

⁵⁵ *Ibid.*, p.54.

⁵⁶ *Ibid.*, p.147.

⁵⁷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Grand Alliance III*, (Boston: Houghton Mufflin Company, 1951), pp.369-375.

⁵⁸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pp.327-330。

⁵⁹ 劉彥章等編，《斯大林年譜》，頁574。

滅後，仍不能斷絕中國之外援。」⁶⁰從這段話可見兩點，第一、蔣介石考慮，日本將蘇聯排除於遠東的可能。其實，蔣介石一直沒有脫離意識形態所造成的疑慮，尤其是他對蘇聯與中共的關係早有不滿，但站在蘇援著想，不得不維持中蘇關係。蔣介石每次在國共間發生衝突時，最為擔心的是對中蘇關係的影響，蘇聯因而停止對華援助，因此竭力維持中蘇關係。

那麼，如果可以解決外援，中蘇關係對蔣介石眼裡的地位又會如何？外援對中國抗戰非常重要。蔣介石認為不能斷絕中國之外援，而且蔣介石期待英、美替代蘇聯的最大援助國的地位。其實蔣介石的心仰賴英、美已經超越蘇聯，但英、美兩國答應的援助兌現之前，仍希望蘇聯對中國援助。所以在6月24日美國駐華大使高斯（Clarence E. Gauss）詢問蘇德戰爭是否將影響蘇聯對華之供給時，蔣即回答「不多」。⁶¹但不久後，蘇聯即宣布中斷對華援助。

其實蘇德戰爭爆發後的三個月內，從蘇聯運來中國的援助物資，除了汽油外，其他已經減少。⁶²10月24日，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通知國民政府，由於蘇聯對戰爭物資的要求日益增多，蘇聯已經無法為中國提供援助。⁶³因為國民政府早就預測到蘇聯中斷援助的可能，反而轉而爭取英、美方面的援助，但這並不意味中、蘇兩國關係從此開始惡化。蘇聯和蔣介石雖然有意識形態上的矛盾，而且蔣介石偏向英、美，但此時英、美兩國答應對蘇援助，並希望蘇聯加入為同盟國，所以蔣介石也考慮到這些因素，對蘇採取謹慎的態度，並發表對蘇聯友善的談話。以下兩段引文是於11月7日蔣介石招待各外報及各通訊社記者時發表的談話，以及軍事委員會歡宴俄籍顧問和武官時發表的演說：

⁶⁰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1年6月24日。

⁶¹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1年6月24日。

⁶² 羅志剛，《中蘇外交關係研究，1931-1945》，頁219。

⁶³ 羅志剛，《中蘇外交關係研究，1931-1945》，頁219-220。

除了蘇俄自己而外，又是很少人認為俄國抵抗能夠持久，……但我們前線的戰士及後方的同胞，都一致地深信者，蘇聯的英勇抗戰精神以及將空換取實踐的最高戰略，必能獲得最後的勝利。⁶⁴

對於蘇聯4年多來特別是今天——當蘇聯本身進行著自衛戰爭的時候，自己遭遇納粹德國殘酷凶暴的攻擊，需要動員全國物力人力財力以應付空前國難的時候，各位顧問仍在我們這裡熱誠服務，這種友誼，更使我們感激……⁶⁵

蔣介石雖在公開場合對蘇聯發表如此友善的言論，無論蔣介石內心對蘇有否不滿，但他並未在公開場合上說出任何足以惡化中蘇兩國關係的發言。

由此可見，先前有研究者主張，蘇德戰爭的爆發是中蘇關係變化的轉折點，但這種主張並不符合事實。王真是堅持這種想法的其中一位學者。他認為蘇德戰爭促使兩國關係逆轉，他引用1941年7月26日的《解放日報》，蘇德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對蘇聯採取冷淡的態度，且進行親德抑蘇的活動，傷害蘇聯的感情，如此蔣介石政府對蘇聯採取的一系列不好的、敵對性舉動，不僅不能緩和兩國既有的矛盾，反而使雙邊關係發生逆轉。⁶⁶但是英、美決定對蘇援助以及檢討包括蘇聯的同盟體制，國民政府卻有鞏固中蘇關係的必要。所以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中斷對華援助，但英美兩國與蘇聯的接近，提供中國更加鞏固對蘇關係的動機。

⁶⁴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1年11月7日。

⁶⁵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1年11月7日。

⁶⁶ 王真，《動盪中的同盟：抗戰時期的中蘇關係》，（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頁177-179。

第三節 太平洋戰爭爆發和中蘇關係

1941年12月8日，日本襲擊珍珠港（Pearl Harbor），美國議會於翌日對日本宣戰，軸心國成員德國亦對美國宣戰。這種情況給予擔心美、日兩國妥協的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新的希望，並給中國重新訂立對蘇政策的契機。其實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所呈的美、日協商過程，難以預測美日關係將會如何發展。最後國際情勢，如同之前的日蘇、蘇德關係，沒有特定公式，到最後總是回歸於根據自國利益，聯合數個國家的強國對決之狀態。

一、太平洋戰爭美、日兩國的動態

如第二章所述，在抗戰初期美國囿於孤立主義政策，對國際糾紛多半僅能保持中立態度，因而也對中國的抗戰不肯提供任何援助。到1938年12月羅斯福總統才批准發放一筆2,500萬美元的桐油借款，其數目雖然不大，但國民政府將之解釋為美國已由原先對中國抗戰「中立觀望」的態度開始轉向援華。此後，中國將美國置於中國外交的首要地位，並為爭取美援而努力。1940年3月8日，美國向中國國民政府提供了2,000萬美元的貸款援助；9月26日，宣布提供給2,500萬美元；1941年4月25日，美國向國民政府交付5,000萬美元的貸款；5月6日，宣布「租借法案」適用於中國；7月底派遣以馬格魯德為團長的顧問團支援中國抗戰；10月10日，向中國交付3,500萬美元的貸款。如此，抗戰中半期起美國開始援助中國，但國民政府無法隱瞞對美國的失望和憂慮。這是因為美國到珍珠港事件爆發前一直與日本進行協商，蔣介

石擔心美國跟著蘇聯之腳步與日本妥協。因此美日關係是蔣介石非常注意的問題，而且是抗戰時期蔣介石決定國際關係的關鍵之一。

正如蔣介石所憂慮，日本在與蘇聯締結中立條約後不久，即於5月11日向美國提出「美日協定修正案」，其內容包含「承認滿洲國」、「國民政府與汪政權合併」等直接涉及中國主權的部分。美國國務卿赫爾對此要求日本「將日方要求之『德義日三國同盟之得以互相援助』、『承認滿洲國』、『國民政府與汪政權合併』等項一概予以刪除，並主張『中、日之和平以日軍撤退為前提』。」⁶⁷其實美國的這一答覆，算是拒絕了5月11日日本駐美大使野村提出的議題。⁶⁸

美、日兩國此時進行協商的真正意圖何在？對日本而言，首先宜注意所謂的「南進政策」。「南進政策」或「南進論」亦是與《蘇日中立條約》有關。「南進政策」是日本海軍向來主張的政策，張鼓峰事件和諾門罕事件以後，日本方面痛感蘇軍的火力、機動性壓倒日軍，所以在陸軍內部南進政策的聲音也逐漸抬頭。⁶⁹雖然無法斷定日本的南進政策就是日本針對美國作戰的考慮，但在乘德國勝利之機，日本具體考慮進處於南方與英美對決。蘇德開戰後第二天日本陸海軍當局決定制定「因應形勢發展的帝國國策要綱」。根據這份綱要6月25日召開大本營和政府聯席會議，會中決定批准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南部的《關於促進南方施策》，並且研究因應德蘇開戰的基本國策方針。⁷⁰雖然在聯席會議中有人提出暫時停止南進政策，發動對蘇戰爭，但7月2日的御前會議正式決定了《因應形勢發展的帝國國策要

⁶⁷ 1941年5月30日條，秦孝儀總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下），頁695。

⁶⁸ 於5月11日日本駐美大使野村致電謂，「日本應允與美國會議，是以美國不參戰及對重慶國民政府勸告和平為前提。」（秦孝儀總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下），頁690。）

⁶⁹ 藤原彰，《日本軍事史》上卷 戰前篇，（東京，日本評論社，1987），頁232。

⁷⁰ 信夫清三郎編，《日本外交史》（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頁664。

綱》，其基本方針是「不論世界形勢如何，也要建設大東亞共榮圈」，其內容有「加快向南擴大的步伐」，「為達到此目的與英美不辭一戰。」⁷¹對北方而言，「秘密準備武力」，「照蘇德戰爭的轉變，如果其進展有利於帝國，行使武力解決北方問題」。⁷²然而隨著蘇德戰爭出現持久戰的跡象，日本大本營陸軍部於8月9日決定，無論蘇德戰爭進展如何，也須放棄1941年內武裝解決北方的構想，而集中力量作好南方對英美的戰爭準備。⁷³這就是放棄對蘇開戰，而專心南進的《帝國陸軍作戰要綱》⁷⁴，由此可見，日本在8月已經開始準備對美開戰計劃。日本亦曾經在5月向美國提出「美日協定案」而被拒絕，但從8月到11月日本卻更積極進行對美協商。Stephen E.

Ambrose根據「經濟性帝國主義」的概念分析日本如此的行為：「日本利用『亞洲人的亞洲』之主張，透過南進政策解決石油不足的問題，美國一定要阻止日本的南進政策。日本早就預測到日後將與美衝突，但是日本儘可能以協商的方式拖延開戰的時間。因為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凍結日本在美國內的資產，並採取禁運措施，禁止石油、鋼鐵等其他必需品運至日本，所以日本在繼續準備軍事計劃與戰爭物資的同時，儘可能摸索對美妥協。」⁷⁵像Ambrose所說日本「儘量延遲協商而迴避戰爭」，事實上在從8月到11月間的美日協商，日本一直堅持曾經在5月被美國國務卿赫爾拒絕的協議案內容，日本似乎不希望達成協議，反而以消極態度拖延時間。日本學者藤原彰也提出過日本準備對英、美作戰，他說：「日本一方面與中國進行戰爭，另一方面經常準備對英美作戰。」⁷⁶因此，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日軍竭力增強軍事力，軍需生產能力增強到1937年的五倍，所以不僅補充中

⁷¹ 信夫清三郎編，《日本外交史》（下），頁664。

⁷² 藤原彰，《日本軍事史》上卷 戰前篇，頁243。

⁷³ 信夫清三郎編，《日本外交史》（下），頁667。

⁷⁴ 藤原彰，《日本軍事史》上卷 戰前篇，頁243-246。

⁷⁵ Stephen E. 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8-1980*,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6), pp.29-31

⁷⁶ 藤原彰，《日本軍事史》上卷 戰前篇，頁230。

日戰爭的需要，還儲積餘量，以準備對蘇、對英美等其他戰爭。⁷⁷由此可見，日本早就預備在12月8日襲擊珍珠港，並對美開戰。

如上所述，日本本來將美、蘇兩國都指定在戰爭可能的對象範圍內。在中日戰爭全面化後，日本陸軍特別將蘇聯視為假想敵，但1941年底日本選擇與美國開戰。除了在1939年諾門罕事件後，日本重新發現蘇聯的戰鬥力的事實外。日本還希望從美國獲得在亞洲的行動自由。眾所皆知，1940年7月26日日本發表《基本國策要綱》，其內容中有「建設以日本皇國為中心，以日滿華的牢固結合為主幹的大東亞新秩序」，27日在《適應世界形勢發展而處理時局的要綱》具體闡明，所謂的大東亞新秩序就是南進政策和強化與德、義的政治聯合⁷⁸，其中含有為了貫徹南進政策，亦不排除與英、美、荷開戰的意義。而且這樣的構想基於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最終目的：「抵抗西方帝國主義而保衛東亞」。然在這種想法背面有日本南進政策，亦即將以前英、美、荷等西方國家所佔領的南洋地區作為本身勢力範圍，這是從要爭取在該地區本身的行動自由和利益的意圖而來的。因此他們早就預料到與英、美等國的衝突勢必無法避免。而且日本強烈要求日本在中國的行動自由。在1941年9月25日日本外相豐田向美國駐日大使格魯（Joseph C. Grew）提出日本對華談話的基本條件⁷⁹，其內容包含「汪政權」和「偽滿洲國」等國民政府無法接受的敏感事案。此條件大部分包括曾經在5月被美國務卿赫爾拒絕的內容。此時赫爾向中國駐美大使胡適表示，美國在展開任何對日談判前須先與中國協商，以及保證美國繼續援助中國。⁸⁰如此，美、日兩國早就堅定彼此

⁷⁷ 藤原彰，《日本軍事史》上卷 戰前篇，頁227。

⁷⁸ 信夫清三郎編，《日本外交史》（下），頁648。

⁷⁹ 日本提出的基本條件內容如下：（一）中日友善。（二）主權與領土完整之尊重。（三）中日之協力國防。（四）撤退日本之軍隊。（五）經濟合作。（六）蔣、汪政權合併。（七）五土地之割讓。（八）無賠款。（九）承認偽滿洲國。（1941年9月25日條，秦孝儀總編，《總統 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下），頁725。）

⁸⁰ 1941年10月1日條，秦孝儀總編，《總統 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下），

的立場，但在外表看來，兩國到11月底進行協商，這使蔣介石擔心美國是否犧牲中國的主權和利益，而與日本妥協。到了11月26日晚上，美國國務卿赫爾向日本大使野村提出要求，日本從中國撤兵以及歸還「九一八」事變以前所侵佔的東北四省，而且建議美、日兩國不承認重慶以外之任何中國政府或政權。⁸¹這是與當初日本提出的基本條件中，「蔣、汪政權合併」以及「承認偽滿洲國」二項違背，因此可以解釋為美國根本無意再持續協商，美、日協商事實業已決裂。事情到這個地步時，蔣介石才認為「此時美國已截獲日本外務省與野村往來密電，知日本原無妥協誠意，故赫爾卒於今晚提此基本答覆。」⁸²蔣介石的這種說法以美國駐蘇大使哈利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的證辭吻合，他記載「英、美兩國已有日本近來採取敵對行為的情報。」⁸³

而且據入江昭的主張，從1939年秋季起，有一種理論甚囂塵上，那就是「和平並不是付出所有代價而維持的絕對善，而是另一種政治現象，若為民主主義的存續而徹底執着於和平，這是比進行戰爭還惡劣。……奮鬥的民主主義才有存在的價值，並且在集權主義抬頭之際貫徹和平等同於拋棄民主主義。」⁸⁴這可視為在拘守孤立主義的美國，對即將爆發的戰爭發生思想層面的變化。尤其在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有些人強調美國、英國、蘇聯應在思想層面團結並互相協助，在與集權主義國家的思想戰一定要得勝。⁸⁵

如前所述，日本需要重整軍備的時間而與美進行協商。與此相

頁727。

⁸¹ 1941年11月26日條，秦孝儀總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下），頁761。

⁸² 1941年11月26日條，秦孝儀總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下），頁761。

⁸³ W. Averell Harriman and Elie Abel, *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5), P.111

⁸⁴ 入江昭，《二十世紀の戦争と平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6），頁156, 161。

⁸⁵ 入江昭，《二十世紀の戦争と平和》，頁161。

比，美國爲了不可避免的戰爭而需要由統合公眾輿論的時間。所以，美、日兩國在協商桌上端出無法達成一致的議題「中國」，藉以拖延時間。因此太平洋戰爭不但是對美、日兩國，同時也是中蘇兩國早已預測到的結果。

二、大同盟體制的確立與蘇聯對日參戰問題

1941年12月7日，日本開始大舉襲擊珍珠港、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等地，因此12月8日美國向日本宣戰。接著在12月11日希特勒向美國宣戰，此時美國尚未對德宣戰，也沒有表示過參加歐戰的可能性，德國先對美宣戰，使美國出乎意料地不但夾在戰爭中間，而且不得不站在戰爭的主動立場，美國在歐洲和太平洋地區便處於兩面作戰的狀態。

其實在6月23日德國進攻蘇聯後，美國國務院發表一份聲明，譴責蘇、德兩國的獨裁統治方式，但表示歡迎「集結起任何力量來反對希特勒主義，不論這些力量來自何方」，因爲希特勒更加危險。⁸⁶此時蒲立德等美國國內對蘇強硬派提出反蘇意見說，「如果儘管沒有得到史達林自制其侵略行爲的承諾，並持續援助蘇聯，戰爭結束後的美國將會面臨比1918年更危險的情況。因此如果要提供援助，須先迫使蘇聯正式宣布放棄在歐亞的領土，並將蘇聯的過境恢復到蘇聯侵攻波蘭前夕的界線。」⁸⁷然而羅斯福不肯接受對蘇強硬派的忠告，且訓令霍浦金斯前赴莫斯科，將一封承諾對蘇援助的信函轉交給史達林：「按照您緊要的請求，美國政府提供給貴政府軍火和其他物資等的援

⁸⁶ 桂立，《蘇美關係七十年》，頁71-72。

⁸⁷ George C. Herring, *Aid to Russia, 1941-1946: Strategy, Diplomacy,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28-29.

助，貴國在兩個月之內可以使用那些物品。」⁸⁸

1939年歐戰爆發的時候，美國的孤立主義仍然強盛，美國人認為不論歐戰的情勢如何，美國決不能介入歐洲的衝突。但是1940年5月隨著法國淪陷，歐洲戰況惡化，美國的公眾輿論明確地轉向反對德國而傾向於同情英、法兩國。儘管贊成直接軍事干預者仍在少數，但公眾們都清楚地認識到；如德國擊敗英國，美國的安全與利益就會受到威脅，德國屆時進攻蘇聯或歐洲南部……最終都將把威脅殆盡美國本土上。⁸⁹

其實在蘇德戰爭爆發前，美國已形成反法西斯主義，而且反蘇感情也已經醞釀很久。但是隨著歐洲情況逐漸惡化，羅斯福總統不顧反蘇輿論，以改善與蘇聯的關係來扭轉乾坤。剛好在德、義、日三國同盟成立以後，蘇德關係出現裂痕。蘇聯駐瑞典公使Alexandra Kollantai向美國公使Frederick Sterling提及，「克里姆林宮方面認為三國同盟明顯是對美、蘇兩國的威脅。」⁹⁰ 雖然蘇德關係惡化，羅斯福也深感與蘇關係和解之必要，但美國無法積極地對蘇援助。因為不僅美國大眾，還有美國國會議員中也不願成為對蘇援助者。除了意識形態的問題外，迴避戰爭的心態也是他們反對的理由。無論國內的輿論如何，羅斯福更堅決主張與蘇聯改善關係。霍浦金斯是最為支持羅斯福這項想法者，他本來對蘇聯問題沒有興趣，但他在1941年7月30日至8月1日訪問莫斯科後，到1945年一直在羅斯福政府裡擔任蘇聯問題的專家。他向羅斯福和邱吉爾匯報莫斯科之行時，強調援助蘇聯在擊敗德國中的重要性。⁹¹ 羅斯福和美國官員們似乎把德國視為主要的敵人，認為唯有蘇聯有力量對付德國。所以他們採取援助蘇聯的間接辦法，得以不參戰又能防禦德國。這可理解為把意識形態置於國家利

⁸⁸ Robert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pp.321-322.

⁸⁹ 孔華潤主編，《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下，頁162。

⁹⁰ Thomas R. Maddux, *Years of Estrangement: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1933-1941*, p.133.

⁹¹ 桂立，《蘇美關係七十年》，頁73。

益下面的一種政策。

訪問莫斯科的霍浦金斯，他的任務是調查蘇聯對於美援的要求和他們對抗德國可以持久多久等。⁹²蘇聯不僅請求美國的援助，而且表示其對美國參戰的期待，史達林請霍浦金斯轉告羅斯福，美國可以（把蘇聯的軍隊）放在美國指揮之下，在任何的蘇聯的戰線都歡迎美國軍隊。⁹³從此可見，蘇聯除了物資援助外，還希望美國參戰。但是美國的輿論與外交政策一直標榜孤立主義而忌諱戰爭，羅斯福政府亦冀望只要透過對英蘇的軍火援助，即能阻止希特勒的威脅。根據哈利曼的想法：

（羅斯福）總統援助蘇聯的決定和意識形態問題幾乎無關。如同羅斯福的認識，這只是美國自私心態的問題。像他曾經幫助英國，若美國介入戰爭（雖然他相信不需要美國的介入），美國基於不用派遣大規模地面軍隊的希望，幫助蘇聯。⁹⁴

羅斯福的對蘇援助以及美國反對對蘇援助的輿論，都基於「美國不介入戰爭」的共同目標。然而不久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羅斯福和全美國人都明白，對美國而言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亦即美國不願介入對德戰爭，而決定援助英、蘇兩國，但日本襲擊珍珠港後三天，德國突然對美宣戰，美國已經無法避開戰爭的漩渦。

1941年12月英、美兩國政府首長們在華盛頓郊區召開協商軍事戰略的會談，籌劃英、美聯合大戰略，並決定德國定為首先要打倒的國家。該決定意味著英、美不得不與蘇聯成立同盟關係。借用Stephen E. Ambrose之見解：這三國皆以「德國」為共同目標，且同盟各國都知道需要其他兩國的幫忙，亦即英國和美國或其他任何兩國的組合

⁹² Robert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pp.326-327

⁹³ *Ibid*, pp.327-330.

⁹⁴ W. Averell Harriman and Elie Abel, *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 p.74.

力量，都不足以打敗希特勒的德國。但是在他們之間，由於存在著不信任感，所以三國的結合可以稱爲是不可思議的同盟。⁹⁵所謂「不可思議」和「不信任感」，似乎意味著由於意識形態的不同所產生的不信任，可是從國家利益角度來看，他們爲克服迎面而來的課題，而須超越意識形態問題。因此「不可思議的同盟」可以評價爲成功。

隨著美國加入戰爭，蔣介石抱著新的期待。那麼，蔣介石的新期待到底又是甚麼？與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同時，他希望對抗軸心國的同盟體制在太平洋地區成立，且該同盟體制得以發揮影響力，中國的戰況也得以改善。尤其是蔣介石希望同盟體制對牽制蘇聯，蘇聯不能再採取對日妥協的行動，進而使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儘速結束抗日戰爭。他這樣的期待可見於12月8日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特別會議決定的對世界戰局之方針：

- (一) 太平洋反侵略各國應即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國領導，並推舉同盟國聯軍總司令。
- (二) 要求英、美、蘇與我國一致實行對德、義、日宣戰。
- (三) 聯盟各國應相互約定，在太平洋戰爭勝利結束以前，不對日單獨媾和之三原則。尤須嚴密注視蘇俄之動向，促其實行對日宣戰，免使日本仍得集中力量侵略中國。⁹⁶

在上述引文中值得矚目的是蔣介石非常關心同盟體制的成立，且蔣介石透過同盟達成兩大目的。第一、他使美國站在同盟體制成立上的主導立場，企圖在經濟和軍事兩方面，穩定地獲得美國的援助。其實中國在歷經三年多的戰爭後，其經濟已經耗竭，所以重建國家經濟也是戰時中國的重要任務之一。爲之，宋子文於1940年6月以蔣介石的私

⁹⁵ Stephen E. 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8-1980*, p.36.

⁹⁶ 1941年12月8日條，秦孝儀總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下），頁768。

人特使之身分赴美，負責借款事務。1940年11月30日美國決定進出口銀行以鎢砂及錫為擔保品，提供給中國5千萬美元的借款，以及由美平衡基金撥5千萬美元。⁹⁷1941年1月國民政府、中國中央銀行與美國財務部長會同議定中美平準基金協定等，中國圖謀靠美援穩定財政。中國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試圖透過美國對華援助進行經濟恢復，逐漸獲得成果。眾所皆知，抗戰初期中國的外來援助多半來自於蘇聯，但蘇德戰爭使蘇聯無法繼續援華，這時候唯一有餘力援華的國家就是美國。與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同時，中國希望美國站在同盟國領導的位子，就是要更積極地爭取美援。所以蔣介石下令外交部長宋子文，立即向美國政府正式提議五億美元的借款⁹⁸，並且接見各階層美國人士提出太平洋戰爭的重要性、聯合同盟之必要以及對華援助之迫切性。美國雖然同意蔣介石的想法，把德國看成在歐洲的威脅勢力，並把日本看成在東北地區的威脅勢力，但是英美兩國在華盛頓的作戰會議中，仍將德國視為最重要的敵人，並決定「先歐後亞政策」，蔣介石對此勢必感到挫折。

第二、蔣介石對同盟體制的成立採取如此積極的表現，其理由是透過同盟體制向蘇聯發揮拘束力。如前所述，蘇聯自與日本締結中立條約，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仍然維持該條約。蔣介石一直不滿蘇聯以該條約為由向日本表示妥協的態度。而且從抗戰爆發以來，蔣介石一直希望蘇聯直接參加對日作戰，但其期待不僅未獲實現，蘇聯反而與日本締結中立條約，讓蔣介石感到失望。與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同時，蔣介石再度寫信給史達林勸說起參與對日作戰。史達林在12日的回信中說：

⁹⁷ 〈駐美代表宋子文自華盛頓呈蔣委員長報告美方決定予我一萬萬美元之借款已由總統宣布電〉（1940年11月3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一），頁284。

⁹⁸ 〈蔣委員長自重慶致外交部長宋子文囑即向美政府正式提議五萬萬美元借款電〉（1940年12月3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一），頁326。

本人以為蘇聯的力量，目前似不宜分散於遠東，……敬懇閣下勿堅持蘇聯即刻對日宣戰之主張。……蘇聯當然必與日本作戰，但準備需要時間，因此之故，再懇閣下勿堅持蘇聯立刻對日選戰之主張為荷。⁹⁹

蔣介石不顧史達林的這次答覆，17日再致電史達林說道：「此關於此太平洋上日寇對英、美之戰而益顯，現在英、美已陷於被動地位，欲打擊敵人已感相當之困難。余意此事為由蘇聯能及早先發制人，則太平洋局勢尚可挽救。」¹⁰⁰蔣介石試圖不斷努力說服蘇聯參戰，因為他認為蘇聯若採取明確參戰態度，可以壓制日本，並早日結束戰爭。部分學者批評蔣介石的態度為，蔣介石不顧蘇聯對德戰況，只顧自己利益，因而造成中蘇關係惡化。¹⁰¹像美蘇各國都以自國利益為目標採取對外政策，蔣介石也不例外。他為中國的利益，希望儘速結束戰爭而力勸蘇聯的參戰，終於成為冷卻中蘇關係的其中一項因素。所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所成立的同盟關係，是在不牴觸自國利益的範圍內，為盡力爭取自國利益和安全的保障而成立的。

⁹⁹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1年12月12日。

¹⁰⁰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1年12月17日。

¹⁰¹ 王真，《動蕩中的同盟：抗戰時期的中蘇關係》，頁178-179。